

一个甲子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,作为文坛、艺坛、鉴坛通才学者的启功先生还不是尽人皆知、如雷贯耳的大名家,但作为他的莫逆之交的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时则会与我谈到他,从身、人品到学问、趣闻,有一次稚柳师说启先生填写一份个人简历,履历中有“专长”一栏,启先生不假思索,仅填了“杂家”两字。这给我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。

铭恩说师尊

坚净翁

——启功先生杂忆

韩天衡

我初次去拜谒启先生是在1978年初春,稚柳师为我写了引见信。当时启先生居住在北京小乘巷的一间陋室里,他看过稚柳师的翰札后,如同老熟人一般满面笑容地和我亲切聊开了。启先生有着一副弥勒佛的面相,嘴角上的笑容,以及一口抑扬顿挫、仿佛说相声般的“京片子”,瞬间化解了我的紧张情绪,心情放松下来。我从布包里取出刚撰写完的《书法艺术》电影脚本,递到他手里,请他提些意见,他浏览了一下,话题由此移到书法上。我那时少不更事,听他说到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便脱口而出:“启老,你在兰亭论辩中,怎么也会说它是假的呢?”话说出口,我才意识到这是小辈有失分寸的口气,也不是应有的切入角度,况且这又是由老师介绍的初次拜谒,一定会引起启先生的不快。我暗暗自责“嘴上揩油”,信口雌黄。不过出乎我的意料,启先生仅是脸色略微严肃,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,而不是在我的唐突,说:“天衡啊,没办法,郭老(沫若)写了条子,叫人捎给我,要我写文章表态支持他,我头上还有顶‘右派’的帽子,能不同意吗?”启先生诚挚而稍带歉疚的答话,使我对他的品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。

不一会儿他转身打开墙边的木橱,取出薄薄一本线装书让我打开看。我小心地一页页翻阅起来,原来这是他悼念前年仙去的夫人章宝琛的诗册,每页上都是他清雅的小楷,每页上都是他真挚的情感,字里、诗行间写尽人世间天人永隔、心曲不通的悲切,及对夫人刻骨铭心的怀念。

或许由于启先生与稚柳师的深厚情谊和相互钦慕,爰屋及乌,那天他的兴致极好,与我谈天说地、道古论今,化艰涩为平白,化学问为趣谈,使原本冷寂而四壁空落的陋室,宛若活色生香的温馨园。在我眼里,启先生是位开朗、透明、厚道、真诚的长者,像宽广而舒缓的大海,像巍峨而敦实的高山,有一种无法拒绝的亲和力,冥冥中与他有了虽非师生而胜于师生的近三十年的情缘。

正值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百年诞辰之期,复旦将在十月召开纪念会,以弘扬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及其人文精神,想来一定会有诸多精彩发言和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,又不免令人想起1989年那时候,先生曾应《收获》杂志的邀约,写有《且说说我自己》一文在前,笔者的这一篇小文,也来说说我心目中的孔阳先生吧,只是很怕自己说不好。

美学探真

孔阳先生1923年生人,健在的话,已经百岁高寿了。先生的家乡,在四川万县(今属重庆)一个环境颇为闭塞的群山中,那山野的景色风物,自然是极好的,便养了先生从小雅爱自然的心性。1941年先生18岁,本想报考西南联大,却因病误了考期,只得去报考尚未结束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,然而先生不喜欢这一专业。好不容易熬过大学毕业,倒是觅得了在银行工作的一只“金饭碗”,这在俗世的眼光里,做银行职员好啊,求之不得的。

可是,一个人的天性及其强烈兴趣,可以说是“命里注定”,岂是可以强拗的?天与与钱币、数字打交道,好比《易经》里说的,遭遇了“无妄之灾”。这让青年孔阳苦不堪言,先生曾经将这一短暂经历,嘲为“坐以待币”。先生最喜欢的,是文字而非非数字。早在1942年19岁那年,已有处女作《力的呼唤——读〈弥盖朗基罗传〉》的发表,这与铜钱银子啥的没有关系。韩愈说过,“师者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”,师教的重要不言而喻,然而凡是成才有大贡献的,天性和对于事业、学问持久的执著和爱好,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。这用毛泽东《实践论》的话来说,叫做“内因是变化的根据,外因是变化的条件”。

笔者对于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,谈不上研究,只是读过他的种种著述而已。先生在美学上的理论建树,正式起始于1957-1962年的全国“第一次美学大讨论”。当时他作为青年学者,有《简论美》和《美是一种社会现象》(1959)等论文问世,造成过相当学术影响。在此之前,《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》(1953)和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(1957)、《论文学艺术的特征》(1957)等著作的发表和出版,已让他在学界崭露头角。从1959年开始,孔阳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,已经从一般的文艺

二

1979年是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。西泠印社在“停摆”了十五年之后,首次隆重举行大型庆祝活动,启先生应邀来到了杭州。由于他迟到一天,见面后,他先把我拉到一边“摸摸”前一天的议程及动态,使我知道整天笑哈哈的他,毕竟是身历百战之人,处事还是非常审慎和周全的。说来有幸,主办方竟然将我安排与他同居一室,那七个夜晚无疑是我一生中不可不吐可嚼、最不能忘怀的,因为每次入睡,关上灯,我俩就海阔天空地神侃起来。我有时请教书画上的疑难,有时闲扯艺坛的一些轶事,而启先生通常晚上的谈兴较浓,不到下半夜二点是绝没有睡意的。我自然不想错过这样“滋补”的机会,便打起精神,聆听他在一堂堂别样又精彩的“西泠夜课”。如某天晚上,启先生问起我篆刻上浙派、皖派及齐白石等问题,好似老师考验学生,但启先生的本意是想多了解,这从他后来的谈话中能明显感受到的。黑灯可壮胆,减少了我的窘迫和紧张,我居然不知深浅地在孔夫子面前读圣经。我从丁敬的浙派评点到邓石如的皖派,乃至赵之谦、吴昌硕,那些见解都得到了他的认同。

又有一个夜晚,他绘声绘色(虽然关了灯,但从声调上能感受得到)跟我谈他与齐白石交往中的趣闻轶事。或许是皇族身份、文化渊源及审美等原因,启先生谈起白石老人没有丝毫顶礼膜拜的成分,他说自己当年二十出头,在一位老辈的推介下前去拜见齐白石,谁知一进宅门就被吓了一大跳,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口威武硕大且阴森的棺材,毫无精神准备的启先生被吓得不轻。其实,这是齐白石把家乡的习俗带到了旧皇城北京,以丧礼喜,多福多财。虽然事情过去了近五十年,我依然在前先生的谈吐里感受到他当年见到大棺材时内心

的恐惧和后来的心有余悸,不禁捂着被子窃笑。这类通天地、连鬼神,生发于民俗低层的诡异而神神叨叨的江湖法术,乃至于白石老道的瞒天过海添寿术,对于做学问的启先生来说当然是不太理解和迷蒙的,好在,随后的拜会,让他与白石翁结下了延续二十多年的艺缘,成为梅坞堂里仅有的一位满腹诗文的入室弟子。齐白石有一回对启先生赞许金农:“金冬心的词写得真好。”博学的启先生却一时想不出一阙金冬心写的好词,遂问齐白石:“何以见得?”白石翁答:“他词写得不好,乾隆爷怎会赐他‘博学鸿词’呢?”启先生心里清楚“博学鸿词”与填词并无关系,听他讲齐白石对“博学鸿词”的误解,可以感觉到他对白石翁的文化修为是有微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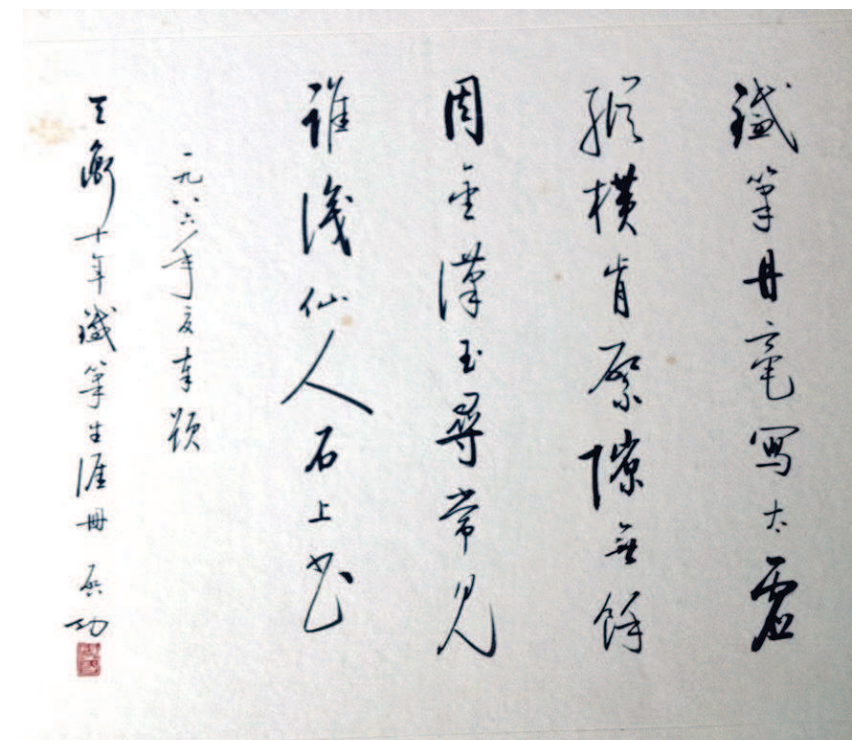
而后启先生问我:齐白石的印章到底刻得如何?我按自己所想作了几点具体剖析:他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,开创“暴力”篆刻审美的先河,在印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然其不足之处在于“简单”,简而单,单而薄则少内涵。启先生要我写得具体些,我说,其“主要缺点有三,一则单刀直入,而弃用双刀,少了丰赡浑朴的变化;二则在篆法用字上舍圆就方,便少了方圆相参、刚柔相济的多元妙趣;三则布局章法多采用虚实的斜角对称,其实章法之妙往往妙在无法无法,变幻莫测。区别于西方惯用的左右等长等重的天平秤,中国的单杆吊秤,往往只需移动前端的二组与前组,则小小秤砣的挪移,就能力压千斤,篆刻的章法也应是如此。”嘿,天衡,你说得好。齐白石去世后在他靠墙的桌子后面就拣出了一本赵之谦的印谱,他其实骨子里是学赵之谦的。”启先生随后怂恿我说,“你应该把刚才对他印章的看法写成文章,一定很有意义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至高无上,他的艺术被推崇至崇,臻于尽善尽美,即使篆刻也是如此。既缺乏

应有的一分为二,更不能说三道四,是那个时段认知上常犯的通病。因为有启先生的“撑腰”,且事关学术,无关恩怨,我之后斗胆撰写了《不可无一,不可有二——论百年篆刻流派印章出新》这篇论文,其中有一段即是批评齐氏篆刻的得失,这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“炮轰”齐氏的文章。1981年发表后,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篆刻界的重视,同时也收到了不少齐派膜拜者的信函指责。1983年,我与启老再次相聚西泠,我跟启老说起这篇文章时跟他打趣:“关于齐白石的文章我写了,不过害得我被人骂了,启老您可是难脱关系的幕后策划呀!”他听了我的“抱怨”,竟吐出舌头,朝我笑着做了一个罕见的“鬼脸”。嘿,我有时被逗笑了,这表情包能出现在这样的大学者身上,真是难得呀!

1984年西泠印社春季雅集,启先生也来了。他特意带了一枝罕见的鸡毫笔赠我,这类笔其实作为品种犹可,书写起来却极难驾驭。我得寸进尺地戏言:谢谢礼物,但我更想请您一张用这笔书写的墨宝。启先生竟抽纸蘸墨,立马挥毫写了自撰的“三代吉金谁见复物,削去一横底得其实”句赠我。不可思议的是,这笔在他的腕底居然运用得心应手,较之平时更见精彩,谚曰“好将不挑枪”,信然。

这次雅集,稚柳师也来到杭州,两老相见分外热闹,我有幸晨起或暮间陪他俩漫步湖畔。西湖的初春,天青如洗,湖水湛蓝,岸侧柳丝依依,远处空蒙的山色则青黛含翠。面对如此美景,两老走着走着即吟起古人的诗句来。启先生吟“水光潋滟晴方好”,稚柳师接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;启先生吟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,稚柳师接“浅草才能没马蹄”。漫步间稚柳师又吟了欧阳修《采桑子》中的“天容水色西湖好,云物俱鲜”,启先生不假思索地接上“鸥鹭闲眠,应惯寻常听管弦”。两老就这样走了一路,撒落了一路



启功为《天衡印存》题诗

的画意诗情。斯文、闲适、高迈,呈现的是一派古高士的倜傥风流。这虽是40年前情景,仿佛犹在眼前,今天看来或许已成为空谷绝响了。

三

1988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改选,大家都已知道启先生将担任书协主席。改选那天我到得较早,就找了会场最后排的角色坐下,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,我回头一看,竟然是启先生,我赶紧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,没想到他把我向里推了一推,坐下后将手掌支到我的耳边,与我咬起了耳朵。他非常冷峻,掏心掏肺地说了些话,直白、沉重且犀利,直击当时书坛的弊病。后来我想,或许启先生知道,在既往那动乱荒唐的十年中,我从未检举、揭发、批斗过一位艺坛的同道和众多的师长,相反混迹其间“丧失阶级立场”,所以他深信我不会将他的话语传播扩散,而他的话几十年来也始终埋藏在我的心底。沉默不是忘却,无言不是淡释,时至今日,再来回顾那段“耳边风”,咀嚼他的那番话,启先生能不设防,不顾忌地与我一吐真言,足见他的刚贞清澈的学者本色,我一直感恩启先生对我的信赖。

我与启先生南北相望,离多聚少,但

疏而不远,隔膜全无,启先生的真实性情、真心真,真感情是不受冷热亲疏和时空影响的。在1986年,启先生赠题《天衡印存》诗一首:“铁笔丹毫写太虚,纵横肯綮隙无余。周金汉玉寻常见,谁识仙人石上书?”可见一个长者对后辈深情的鼓励。不过有一次他来上海,我拿了习作请他指导,他看了我的习作后又谛视着我,笑眯眯地只说了三个字:“拿破仑。”我听得云里雾里,可惜当时未有访客,未及释解,至今成谜,憾甚。

时光匆匆,启先生鹤驾南天18年了,带走了他的音容笑貌,他的学问智慧,和他有趣而高贵的灵魂,令我悲痛。他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品格,这成就和品格是不朽的,这又是大可欣慰的。

启先生,一个时代知行合一的大学问家;启先生,一个为大众不遗余力弘扬传播经典艺术的师长。古往今来,要把这两端合二而一是那么的难能,启先生做到了。他在晚年,以著书立说的石砚上有旧铭“一拳之石取其坚,一勺之水取其净”,颜其居为“坚净斋”,也自号坚净翁。启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,早中岁历经坎坷,而能坚韧不摧,晚年享大名,多利益之诱,而能洁净不污,就是对坚、净两字最好的阐释和践行。

二〇二三年八月于华山

也来说说孔阳先生

王振复

先生原名述亮,后改名“孔阳”,取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“七月流火”“我朱孔阳”语。这里“孔阳”的“孔”,有“大”的意思,“孔阳”便是“大阳”的意思,是一个“很阳光”的好名字,其喻义,正如先生所说,“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,更光明一点”。

生过在时间上稍微先于中国的一场“美学讨论”。也才知道,原来中国的这一“美学大讨论”,一定程度上实际是“苏式派”、“美在中国”。苏联有以波斯彼洛夫、德米特里耶娃等为代表的“自然派”,以布罗夫、卡冈等为代表的“主客观派”,以万斯洛夫、鲍列夫等为代表的“社会派”,等等,这些与中国当时的“客观派”、“主客观统一”派和“社会实践”派等等,在美学见解上是大致相应的。不同的是,当时中国的“美学大讨论”,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“批判修正主义”的主题。为此,主张“美在主客观统一”和“美在主观”说的朱光潜先生等,曾经受到程度严重的“批判”,而主张“美在客观”和“美在社会实践”的学者,因为基于“唯物论”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“实践”说,其理论要“雄辩”多了。

孔阳先生是一位智者。他对这一段美学理论争辩的历史因缘,不可能不知心知肚明。这里,所以要略微追忆一下中、苏“美学大讨论”的一些情况,是因为孔阳先生“创造论美学”的创构,正是接受、消化与批判“第一次美学大讨论”而再创的思想成果。先生无疑是善于博采众长、自裁新学的学者。孔阳先生的美学,自当以马克思《巴黎手稿》关于“社会实践”与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”说为其美学理论基础的,但是他并未将自己归于“社会实践”等的任何一派。1979年,先生所发表的《美学研究的对象、范围和任务》一文,已经提出和论证了他的“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”说,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,而且强调指出,这一“审美关系”,是以“艺术审美为主”的。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命题,不再纠缠于美在“客观”“主观”“主客观统一”还是“社会实践”等的单打一的见解和争辩,实际是在将“美学大讨论”四派之见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思想成果。我们可以看到,无论美的本质、美感还是自然美等,都可以归结在“美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”这一命题之下。

孔阳先生的“创造论美学”,有一个“美在创造中”“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”

感为难,说“孔阳先生倒是很熟悉的,但是先生那么忙,我真的不敢啊”。萧于是说,“那我帮你给先生打一个电话吧”。第二天,我怯生生地将一大叠稿件送到先生府上。

岂料先生一口应允,亲切又温和地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要?”我赶紧说:“不急不急!”看我局促不安的样子,先生安慰我,说“不要紧的,我会抓紧的”。先生的这一态度,让我深受感动。这好像不是学生去麻烦老师,倒是他这个“学生”,会按时完成这一份额外的“作业”似的。

不到一个星期后的周五下午,“政治学习”结束后,蒋先生将手写在稿纸上的一篇文章给了我,还说了一句“请多批评”的话。回家我一字一句拜读先生的这篇大序,感到心脏怦怦乱跳,手心微微出汗。先生说我的这本小书“资料翔实,论证深刻”,“把美学和文学联系起来,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《周易》的美学智慧”,等等,让我汗颜。我相信,以孔阳先生慧眼,不可能不发现这本小书的某些缺失,但是先生总是严于律己而待人宽。我把先生的称赞,真诚地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。我知道,先生一生中,为学生、同事甚而许多素不相识的作者,撰写过100多篇序文,请想想,这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!先生总是有求必应,奖掖后学,宅心仁厚。

我1964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读一年级时,很幸运的是,我们中一(乙)班的写作课老师,便是敬爱孔阳先生。当时先生41岁,看上去年轻十岁,戴一副棕色镜框的眼镜,一身灰白中山装,显得素朴、从容而儒雅。

先生要我们每位同学写一篇作文,题材、体裁和主题不论。我交上去的,是一篇所谓的“小小说”《坝》。这篇东西,无论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构思与书写,都是十分幼稚的。不料第二周上写作课前,先生已经亲自打印了这一篇习作,上课时,发给每位学生一份,组织大家分组讨论这一习作的优劣和缺失究竟在哪里,最后由先生总结。我这一学习写作的起步,根本不值一提。可是,先生是一位善于播种美的种子的真正的园丁,哪怕土地贫瘠、不宜开垦,也会满腔热忱、不辞辛劳地加以耕耘、浇灌和呵护。

过了几周,先生在课间休息时,招呼我跟他一起,到当时新华书店开设在复旦老教学楼底层的一个小小门市部,买了上下两册的《西方文论选》送给我,那是由外文系土鑫甫先生和孔

阳先生主编的,是1962年的初版本。我学区一介愚钝学子,啥都不懂,竟然蒙受先生如此的大恩大惠,真的是令我终身难忘。

理智的谦逊

孔阳先生有三句格言,都是他一生认真实践了的。除了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“为学不争一人胜,著述但求百家鸣”两句外,最值得深思的,为“不是我占有真理,而是真理占有我”。我最初听到这句话,还是在近60年前先生为我们开讲的写作课上,深感震撼,当时难以领会其思想的真谛。

先生曾经在《且说说我自己》一文中说过:“我是一个书生,百无一用。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。读书的目的,是要增长知识,明辨是非,活跃思想,探索真理”。又说,须知“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。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贡献,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”。这一关于真理的思想,其实早在1942年先生所写《力的呼唤——读〈弥盖朗基罗传〉》一文中已经有了。先生说:“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‘顶点’,灵珠在握,天下都得听我的了。浮士德与魔鬼订约,要永远不满足,一旦满足了,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。”说的真是太警醒了!这就等于说,凡是声称自己永远“真理在握”的人,其实是“魔鬼”附身、“灵魂”出窍。真理是客观自存的权威,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发现它、敬畏它、把握它,而不能自封“我即真理”,甚至嘲笑、奴役、“创造”它,否则便是对真理的亵渎。真理的崇高,是拒绝冒犯的。这一思想,确实很“美学”。

由此不难理解,为什么孔阳先生的为人,总是如此虚怀若谷、平易近人。原来在先生的人格中,始终有一种“理智的谦逊”。

一个人的谦逊,在长辈面前可以做到,在晚辈、在所有的人甚而在动物、草木面前,也能持有谦逊、谦卑的态度,就很难了,而孔阳先生能够自觉地做到。

这就不难理解,当弟子在大为肯定先生的《德国古典美学》而同时提出些商榷性意见时,先生为什么能够立刻感佩其“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”了。先生的如此雅量,绝不是每一位导师都能够具备的。《周易》有谦卦,它的六个爻都是吉爻,这在六十四卦中,是独一无二的,先生确是一位“谦谦君子”。《易传》说: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。”谦德,天地之性德也,先生“理智的谦逊”,是循天地而为一个榜样。

先生原名述亮,后改名“孔阳”,取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“七月流火”“我朱孔阳”语。这里“孔阳”的“孔”,有“大”的意思,“孔阳”便是“大阳”的意思,是一个“很阳光”的好名字,其喻义,正如先生所说,“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,更光明一点”。“大阳”,寄托着先生一生的人格理想,它不张扬、不外露,而是内敛、深邃而谦和的。

